

成 慶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1993年亨廷頓 (Samuel P. Huntington) 的 文明的衝突? ( "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 在世界範圍引起了軒然大波，作者對多樣文明能否和諧共存畫上了問號，不同文明屬系的政治勢力的互相對抗成為亨氏文中的一個自然結論。但是隨著跨國資本不斷向外擴張，並且挾夾西方政治、文化席捲全球，全球化 ( globalization ) 頓時成為世人口邊的熱門詞彙，人們開始對全球一體化充滿憧憬。但是我們同時也要考慮的是，全球化能否在不同的政治、經濟、文化背景之下形成一個全球性的秩序？如果在民族國家的框架裡不能做到，我們有可能在超出民族國家的視野裡，看到形成一個全球共同體 ( global community ) 的希望嗎？

哈佛大學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帝國》 ( *Empire* ) ，就是對以上問題的直接回答和展望。該書由兩位作者合寫，其中哈爾特 ( Michael Hardt ) 是美國杜克大學的文學副教授，而另一位內格里 ( Antonio Negri ) 曾經在巴黎大學和帕多瓦大學任教，由於在70年代從事激進政治活動，被控以「恐怖份子」的罪名，現正在羅馬服刑。有人在互聯網上發起簽名活動要求赦免內格里，想必此人在意大利影響甚大。《帝國》問世以來，在美國一時洛陽紙貴，更被翻譯成 國語言 ( 還未翻譯成中文 ) ，《紐約時報》 ( *New York Times* ) 與《時代》 ( *Time* ) 等大型紙媒都給予很高評價。由於此書將後現代理論與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加以結合，因此有人甚至將之與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相提並論。

這本書的左翼色彩無疑給那些反抗全球化的左翼人士們提供了新的理論武器，作者動用時下流行的後現代理論對傳統馬克思學說進行了一次「時髦」的改造，這也就是所謂的後馬克思主義 ( post-Marxism ) ，它一面繼續以批判資本體系的不公正為主要原則，一面也批判所謂現代性的「整體性敘事」。姑且不論這種理論結合是否成功，我們主要關心的是作者如何在此理論框架中闡釋和說明他所謂的「帝國」。

本書的結構 分清晰，正如作者在 序言 裡提到的，此書可以順讀，也可以倒讀，甚至可以抽章節出來閱讀。書一開頭，作者就綜述了當今世界秩序的一般問題。傳統的世界秩序是以民族國家主權為前提的，霍布斯 ( Thomas Hobbes ) 和洛克 ( John Locke ) 這兩路傳統最後提出的超民族的主權形式都未超出傳統民族國家的範圍，從而無法在全球範圍內最終解決主權形式的問題。而我們目前所設想的超民族國家的權威合法性是建立在甚麼基礎上的呢？作者認為這個權威架構是盧曼 ( Niklas Luhmann ) 的系統論與羅爾斯 ( John Rawls ) 的公正理論的混合，是一個「無政府的治理」 ( 頁14 ) 形式。而它又必須超脫包括自然權利、憲政

法、契約論等司法傳統，建立一個超民族的司法架構。而對於這一架構而言，具備統治異議的權威和應用警察力量的能力就成為構成其權威的兩個基本前提。但是既然要整合不同民族國家的權力，那在各個民族國家與超民族的權威之間必然出現衝突，因此超民族的權威必須擁有「干涉的權利」（right of intervention）（頁18），依靠這種干涉，可以影響以及決定單個民族國家的法律。不過作者也解釋道，這種干涉不是在簡單的權利（right）名義下進行的，而是以「對正義必要原則的訴求」（appeal to essential values of justice）為基本原則。但是這一種以民族國家為基本單位的超民族權威架構，在作者看來只不過是通往帝國的雛形而已。他所認為的帝國是一個依靠生物性權力（biopower）的控制社會（society of control），但是這個控制社會又是不同於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規訓社會（disciplinary society）的，規訓社會是利用一套規訓制度，比如監獄、工廠等等來進行規訓的外部治理，但是控制社會則是依靠命令機制（mechanisms of command）來管理社會生活，並且這個機制是內化為個體的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之中的。

作者在這裡進一步解釋道，在控制社會裡，當權力變為生物性政治（biopolitical）權力之後，權力本身實際上也就潛入個體的意識和身體之中，因此社會也就被這一無處不在的政治權力所控制。而正是這種對身體的直接控制，構成了帝國生物性政治的最大特點。而且對於資本主義而言，也正是資本生產使得這種全面控制成為可能，資本通過跨國公司不斷擴張，進而控制了生產、流通以及消費領域，並且直接抵達人的主體性，使得人也成為資本世界的一個產品。但是作者又認為，通過如此的全球化形式形成的帝國與二世紀初的帝國主義還是有區別的，歐洲式的帝國主義信奉二元式的權力地理學，如本國與殖民地，中心與邊緣等等，這種二元性政治使得帝國主義的世界秩序是不穩定的，而帝國卻是去中心（decentred）和反領土（deterritorialising）的。

作者在第二部分繼續寫道，帝國的形是民族國家現代性主權衰落的自然結果，帝國就是後現代主權的一個開端，它標明主權的現代性危機的最終來臨。作者對民族國家的主權以及民族本身進行了歷史性的概念分析，最後得出結論：民族作為現代主權的起源的意義是巨大的，而民族權力的衰落以及殖民地的逐漸消失都同時意味著對於現代性主權危機的解決方案最終失效，我們必須尋找解決危機的新出路。後現代一直以消解現代性中的二元辯證法為己任，而強調多樣性，這對現代性主權的確構成了極大挑戰。帝國本身就是混雜不同認同、不同階層的全球性疆域，這就需要一種「多樣性管理」（diversity management），也就是所謂的「差異的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頁153）了。

但是問題在這裡出現了，作者引入了一個「大眾」（the multitude）的概念，大眾就是「生產性和創造性主體的全球化」（productive, creative subjectivities of globalization）（頁60）。而「大眾」一詞的意義在這裡是非常模糊的，缺乏有效的政治、文化、社會學的分析，也就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出帝國的想像構建雖然具有想像力，但是缺乏有效的理論分析來支撐。

作者接著進入他的政治經濟學分析部分。正如他在第一部分裡提到的，資本的本性是不斷擴張，以對外圍（the outside）的剝奪來滿足內部（the inside）的需求，但是由於帝國主義是以民族國家為基本單位的，並且加上壟斷程度的加深和各種貿易壁壘，使得帝國主義反而成為資本進一步擴張的阻礙，世界市場也無法真正的實現，也正出於這個原因，作者在分析完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之後得出結論：「要麼是世界性的共產主義運動要麼是帝國」（頁234）是帝國主義危機的出路。作者對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的新政給予很高評價，認為新政代表了一個規訓社會的產生，生產和再生產過程都統攝於國家和資本的調控下

（頁243），而這樣的規訓社會也就等同於工廠似的社會。也就是順著這一思路，作者繼續發揮道，在戰後的世界體系中，美國無論在金融、軍事以及政治上都扮演了引導資本主義向帝國發展的角色。在當今的世界裡，資本已經將各個國家都籠入一個全球性的網絡之中，全球市場的逐漸形成也表明沒有一個國家或地區能夠孤立於這個網絡之外（頁284），並且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我們已經進入信息經濟（informational economy）的階段，勞力也成為非物質化的社會存在形式，從而未來的全球經濟布局將不同工業社會的那種集中、壟斷化的形式，而是分散和沒有中心的。作者充滿信心的描述道，這種新穎的信息技術將和生產過程完全的整合起來（頁298），從而在政治領域裡形成既是民主式（democratic）又是壟斷式（oligopolistic）的機制。民主式是指這個信息網絡的廣泛分布，而壟斷式則是指每一部分都可以作為獨立的信息生產源來作用。作者在這裡似乎有很大的思維跳躍，認為高科技的信息技術使得整個社會的交流形成一個信息共同體，使得帝國成為可能。但是實際上信息技術本身不能消解不同地域的文化差別，信息技術的擴展雖然具備一個交流的媒介作用，但是能否達到共識卻是難以證明的。

對於帝國的政治結構，作者進行了一個歷史分析。古希臘歷史學家波利比奧斯（Polybius）把羅馬帝國的政治體制描述成君主政體（monarchy）、貴族政治（aristocracy）和民主政治（democracy）的混合體，而帝國則沿襲這一古老傳統，不同的是，它通過上述的信息網絡整合了這三部分（頁318），並且能夠隨著不同的社會變動進行即時的調整和安排。與此同時，普遍性與個體之間，權力的自明性和個體的自我判斷之間，以及權力支配下的主體生產與個體自我的反抗之間，亦形成了對這個混合政體（hybrid constitution）的反抗。但遺憾的是，我們在全書中很難找到這種反抗將會以甚麼樣的形式出現，作者似乎在這些對全球化的理論關鍵分析點上玩起了「太極」真功。

全書到了這裡，基本上勾勒了帝國的輪廓，但是我們也產生了很多疑問，比如全球化僅僅是網絡化的過程嗎？信息網絡化能夠消解文化差別嗎？帝國的混合政體對權力的安排是否可能？這些都成為了本書敘述的軟肋之處。但是這本書無疑為我們描述了當今全球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可能性，可以說充滿了想像力，但是這一想像的帝國是否能真正化作歷史事實，還需拭目以待。